

濟南事變身歷記

(選載)

羅家倫

日本要滅亡中國，就絕對不能讓中國統一，它才可以分別的宰割。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以來，連戰皆捷，聲勢浩大。當民國十六年克復南京以後，日本就已經計劃在黃河流域打擊我軍，六月間我軍抵達山東臨城滕縣一帶，日本在七月間就從大連增兵三千多人赴青島。七月十八日日軍砲隊帶了十幾門大砲由膠濟路開到濟南，當時若是我軍繼續北伐，恐怕濟南事變早在那年已經發生了。不幸因為寧漢分裂的結果，總司令蔣先生

在八月十二日翩然下野，北伐之師因而停頓，所以日軍因目標喪失，在八月三日日方駐上海領總事矢田致函我方交涉員通告撤兵。到十七年初，蔣總司令復職，仍然繼續北伐，經過大規模的部署以後，這一場志在統一全國的大戰，於四月四日在津浦線上開始。我軍於十日克復臺兒莊，十一日克鄆城，十二日下棗莊，十三日下臨城，十九日下鄆縣，二十日下卞臯兗州，張宗昌的部隊和支援他的奉軍望風西潰，於是日本海軍竟於二十日在青島登陸，而在青島的陸軍亦就開進濟南，這是日本第二次阻止北伐在山東境內的出兵。這種行動，真所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，濟南

的浩劫，是無法避免的了。二十一日我外交部雖提出抗議，但是有什麼效果呢？

四月二十二日，北伐軍克復泰安、肥城，二十九日第一集團軍的一部份已打到膠濟路的明水鎮，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又抵濟南近郊。蔣總司令進入濟南城繼續指揮北伐是五月二日的事。我是在四月間和大軍一同由南京出發的，擔任戰地政務委員的職務，並兼管教育處。政委會的職權，是一個中央政府在 frontline 配合軍事行動的縮影，每一個處代表中央一個部，在戰地行使職權，也就是說每逢克復一個地方，這地方上的政務就由該委員會的各處分別管理。我能代表大學院處理戰地教育事務，實感幸運。我於二十日到達兗州，對於該地教育工作，略事部署；然後沿北進途中，在泰安稍事逗留；直到五月二日晚間才進濟南城。三日一早，我到山東教育廳去視察，對於該省教育工作人員尤其是教員特別加以安慰。不料我講話快完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連珠的步槍和機關槍聲，據當地的報告，說日軍和國民革命軍已經在濟南城外新市區打起來了。於是我急忙地回到總司令部（該部臨時設在督軍公署裏面）見到蔣

先生，簡單的商談應付方略，我們都認定，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，但是爲了完成北伐大計起見，還當盡力設法制止軍事衝突的擴大。在總司令部裏，各方的情報來得很多。我方搜到日軍指揮官發給軍隊的命令中有「命令二下，驟然而起」等字樣；可見此次的衝突，決非偶然而是奉命的。有一日本武官佐佐木逃避到總司令部，我們立刻予以保護。我方並以白布大書「禁止衝突，各軍立回原地」字樣，沿途巡行並禁止開槍，但是到下午槍聲還是激烈，大約是二點鐘時，英國曼傑斯特導報的名記者丁白萊（Timperley）亦避入總司令部，要求我爲他發一個電報出去。當時普通電臺因秩序紊亂，工作已受障礙。我想盡方法，由總部惟一的一座短波電臺將該電發出，這是濟南以外所收到關於濟南事變第一個電報，而這個電報是一個中立觀察者打出來的，所報導的全是他目擊的事實，態度亦很公平。五三這天，外交部長黃郛恰巧在交涉員公署裏，被日軍劫持到日方軍部裏去。黃部長要想同日方負責人談話，曉以利害，不料不但這個目的不能達到，而且日方反脅迫他在一個報告上簽字，這報告是說中

國軍隊在某處打死一個日本軍曹，其用意是要把戎首的責任加諸中國。黃堅決不肯簽字，但因被糾纏不止，祇在上面批了一個「閱」字，日軍才把他送回到我軍區域以內。最不幸的是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先生壯烈的犧牲了。蔡先生同黃鄂一樣，曾在日本留學，兩個人都能說流利的日語，和日本人常有往來，所以我軍第二次北伐出師以前任黃為外交部長，蔡為外交處主任，原意就是為便於處理對日交涉。不料蔡烈士竟因此而犧牲。這是三日夜間和四日清晨的事，日軍深夜將交涉員公署包圍，蔡烈士用日語抗議；日本兵將他捉住，加以侮辱，要他跪下，他拒絕下跪，遂遭慘殺。日本知道理虧，怕文明世界加以譴責，於是便進一步演出毀屍滅跡的無恥慘劇。蔡烈士死的消息和真相，我們到四日上午由他一個勤務兵逃到總司令部來報告後大家才知道。當時槍砲聲還非常密集，我們大家商量應當趕快提出抗議，宣佈日軍此種野蠻的罪狀。蔣先生乃囑我起草一個抗議，我寫就草稿，送請大家一再修正後，當天發出，也就在四日上午忽然來了一架飛機，在總司令部上空投彈；一個就投在總司令辦公室的池裏，幸而沒有炸；另一個炸彈落在我們睡房後面的一個四合院子的中間，一共死傷十九人，其中有官長二人。這架飛機標誌不明，很可能是日方的飛機，或是由日人駕駛為張宗昌作戰的飛機，因為張宗昌的殘破部隊裏，決沒有在當時這種新設備和駕駛員。四日下午槍砲之聲稀疏，日方的態度忽然和緩，日軍司令官福田彥助還派一個參謀到總司令部來說這次衝突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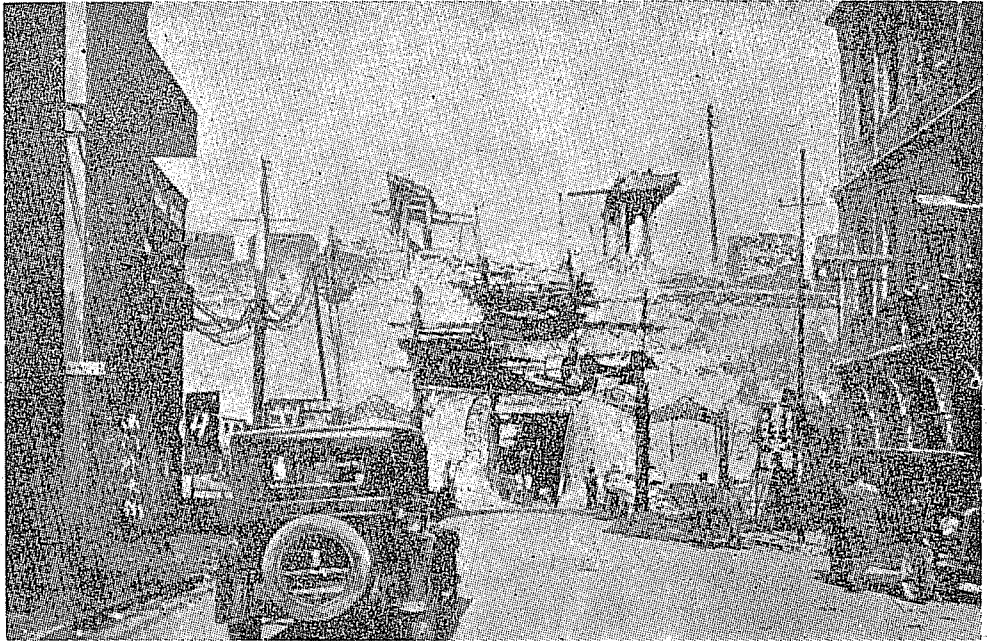
於誤會，要商量解決辦法，經蔣總司令明銳的判斷，認為這是日方緩兵之計，不可上當。他表面仍和日方敷衍，可是到晚上他正在右邊一個大廳裏和前敵總司令朱培德；總參謀長楊杰、高級參謀熊式輝，重新部署軍事，定下退出濟南將北伐大軍分五路渡過黃河的計劃。在這個大房間裏，把軍用地圖釘滿在壁上，舖滿在地上，由熊高參拿了各顏種色的粉筆和一大塊橡皮，脫了皮鞋在地板上的地圖中間行走，擬定各路渡河後進兵的路線。每次劃到一條線之後，在場的人從各個角度加以考慮，再行更改或修正，如此在弄到深夜。那天晚上我因為有事進入這間房間，亦就默默無言的停留下來，看到終止。五日上午蔣先生要我擬一個給英美兩國在濟南總領事的函件，通告他們我軍退出濟南，僅留極少數維持治安部隊，使濟南成為不設防城市，此後一切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如因戰事而受損害，應由日本負完全責任，同時提到我方為領館人員安全着想愿意給他們一切應有的保護。當時在濟南祇有這二個總領事館，我於五日下午五時將這兩件的中英文本預備完畢，下午六時奉命同曾養甫先生一同前往訪問該兩國總領事；我們坐的是總司令部的小汽車，並帶了三個衛兵一同出發；幸而得到沿途老百姓的通報，指示某街某巷有日軍哨兵及障礙物，要我們設法繞道避開；我們按照老百姓的指示，居然二館都能先後到達，雖然經過許多街口時流彈還在亂飛。我們兩人把這函件分別面致該兩總領事；他們都深感我方的好意，却都認為領事館是他們職責所在地，沒有奉到本國政府命令不能

離開，他們對於日方起釁的經過是很明瞭的。我們辭別以後，到晚間十一點多鐘才迂迴的回到總司令部。我回想當蔣先生要我起草這個文件的時，我曾經問他道：「我們就這樣退出濟南城嗎？」我問這句話時，當然是我胸中有種不甘的心理。蔣先生回答我說：「等我把軍事擺開以後，才同他們說話！」事後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有意義。其實就在那天下午，我軍已按照新定的計劃開始渡河了。

六日一早，蔣總司令和朱培德、楊杰、熊式輝等一行便裝騎馬出了濟南城，我和陳立夫、邵力子、曾養甫、高凌百、和一部份總部人員還留在濟南城裏一天，料理未竟事宜。到下午五時，應辦的事大致已辦好了，於是我和邵、陳、曾諸人弄了一部舊汽車到一個澡堂子去洗澡；可是澡堂子裏已關門了。我們好不容易得到堂主的同情，知道我們在酷熱的天氣下日夜奔波汗酸同灰塵凝成一片的痛苦；他居然叫人燒起水來，讓我們輕鬆一下。當時感激的情緒，真是不可言宣。

七日一早，我們一道由總部出發，因為譯員黎琬同志工作勤忙，害了嚴重的燒熱症；我們不能在患難之中丟掉朋友，於是我們繞道把他送到齊魯大學的醫院，拜託該校教務長程其保先生設法特為醫療，然後向黨家莊出發。沿途經過白馬山地帶，祇見老百姓扶老携幼的逃奔鄉間，我們雖無老幼可携，而且病人已安置好了，但是這羣挑夫所挑當時唯一的那套短波無線電臺設備，是一件無價之寶，亦可以說是我們對外通訊的命脈。不料走到白馬山附近，天空又來了一架飛

被日軍砲毀之濟南市街



家莊，他們最初答應了，但是汽車開出不到五華里的地方就拒絕再送。我們祇得下車步行，經過辛莊、張莊等地；沿途都是日本軍隊，以急行軍的姿態向前開動，等我們到離黨家莊不過三四里的地方，兩面的軍隊已開始以密集的砲火互相轟擊，子彈橫飛。我們知道這道火線是無法安全越過的，於是又後退二里，恰巧在路上遇到一輛日本的裝甲砲車，將我們攔住了。車上跳下一個士兵拿着手槍對着我們的胸口；我們昂然站住了，於是他們又把車上的一個小砲口對着天翼的頭；然後由車上再下來一個軍官，他對着我們說，他姓黑田，是福田的參謀，他說我們在福田司令部交涉的經過，他都知道。他隨即指着一個在附近開花的砲彈，由我方射來的，正色厲聲的對我們說：「你們看！這不是你們打過來的砲彈？」我看見這個情形，就把我口袋裏藏的一封福田的哀的美敦書，拿出來交給天翼；天翼對他說，這是你們司令官的信，我們是有任務的，我們不計較自己的安危，祇問要不要達成這個任務。這時黑田軟下來了，指給我們一條小路說道：你們可以從這條路繞道過去，我們就循着這條路避開火線的正面到達饒頭莊。該地許多老百姓指示我們一條比較安全的路線，繞進泰山山脈；他

們對日軍的敵愾，正是高張萬分。他們對我們二人的稱呼忽而是參謀長，忽而副官，忽而老總，天真得可笑。因為我們對他們客氣，所以他們對我們特別友好和尊重；因為他們感覺到國民革命軍對老百姓的態度和張作霖、張宗昌的部隊顯然有極大的不同，所以他們友好的心情亦就充分的表露出來。就在饒頭莊我們找了二個老百姓做嚮導，問由泰山山脈邊緣的路線直奔泰安或是泰安附近的鐵路線，因為我們預料總司令部的列車一定是向南開的，泰安是可能的目的地；但又很可能在泰安以北的任何站停留。可是我們一入泰山山脈以後，便感覺到夜間在崎嶇的山路裏攀跋的困難，尤其是沒有月亮的晚上，況且饑餓與口渴交迫而來。到夜間十二點左右，在一個山坡這邊看到一個茅蓬內有微微的燈光。我就要去敲門，天翼阻止我；他說，我們是外埠的口音，夜間敲門，裏面人是一定不敢開的，不如讓嚮導去敲。天翼是對的，果然嚮導一敲，門就開了，裏面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，兒子出門去了，一個人住在這裏；她為我們燒了壺水，又在床下一個小扁桶裏，極醜的破棉衣底下，拿出三個饅頭來，咬下去其硬如鐵；但是略用開水在口中溶化，頓覺其味無窮這堅實的饅頭，我們每人吃了一個，還有一個天翼要我放在口袋裏，以備途中不時之需，走的時候我們送給這個老太婆二塊銀元，她感謝的心情可以從她眼眶的淚痕充分的表現出來。二個嚮導不能引完我們全程，所以祇有在沿路一站一站的更換。又在路上遇到一個散兵，背上背着一桿槍，於是我們收容他為同路人。又在山腳下遇到一個連哨，問到了當夜的口令。在另外一個山角裏，又看見了紅槍會在晚上自衛的守望方式。我們先在這幾十家的村落的牆角上，看見一個老

被日軍砲毀之濟南砲台



者，穿了老棉襖，拿了一枝有紅纓的槍，蹲在牆腳下，幾乎使路過的人看不出來。他和我們接觸以後，立刻鳴鑼通知本村睡眠中的人；於是來了二十三個壯丁，問明我們的來歷，我們對他們說：我們是要報告蔣總司令發兵來救濟南的。他們頓覺興奮非常，要派人護送我們一程。在兩三點鐘的時候，月亮漸漸起來了。我們走到一個地方，遠看有一座小的鐵橋，知道這是津浦鐵路上的橋，乃向橋邊走去；可是究竟我軍現已退到何處，此時亦無法決定。當時心裏想。若我軍退到橋的南邊，那麼這道橋也可能在敵人手中。我們行列進行時彼此間保持相當距離，輪流派一個人像放哨似的前進，等到快到橋下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一個士兵大叫一聲「口令」！我們立刻用路上所遇連哨告訴我們的口令回答，於是乃確定了這是我們自己的部隊。這道橋，就是張夏車站附近的橋。張夏離濟南八十里，我們從黨家莊進濟南，又從濟南走許多迂迴路進入泰山山脈，在二十小時左右的時間

，大約一共走了一百三四十里的路程了。我們再走一段到達張夏車站，看見車軌上停了兩列裝甲火車：一列是中山二號，一列是中山四號。他們都是從黨家莊退回來的，士氣非常激昂，希望再開向濟南作戰。這時張夏車站防守的部隊長已經接到泰安的命令，說是有熊羅二人到達任何地方，務派專車送到泰安，於是我們就坐了中山二號向泰安行駛，在早晨七時左右，到達泰安，仍與總部會合，將一切的情形作一詳細報導。當我們八日從黨家莊出發的時候，蔣總司令已將此行電告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。到九日上午，南京還不知道我們回到泰安的消息，所以我們兩人的死訊已經紛傳。到下午三時，我們回到泰安的電報到達南京了，大家方才放心。

說到我們退出後的濟南情形，也是非常壯烈和慘痛。日軍於五月六日夜間開始猛攻濟南，敵方的兵力約一師人，打了兩天仍然打不進，而且犧牲很大。到九日濟南守軍奉到撤退的命令，及退却路線的指示後，就在夜間開始突圍出城；那知不到三里，日本埋伏的軍隊，以逸待勞，把我們第一團全團官兵打死在一千人以上。犧牲慘重的情況，可想而知。到十一日日軍方才正式開進濟南城。可是我們改變戰略以後的國民革命軍強大部隊，已經分別到達黃河的北岸。在若干渡口強渡時，日軍曾分股前來襲擊，以圖阻撓，但是我軍一面分兵抵抗，一面冒險強渡，終使到達北岸的兵力，仍能結合成爲平定華北的主流。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告南北統一完成。我們這種國民革命的精神，決不是任何帝國主義可以壓倒的。我願意把這段目擊身受的經驗，據實向大家報告，以表示我對於濟南事變中壯烈犧牲的同志同胞們無窮的哀思，無上的敬意。（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、大專院報告）（摘自革命文獻）